

艺文述林

语言学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艺文述林

语言学卷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论汉语方音的区域特征

李如龙

一 界 说

本文所讨论的区域特征指的是在一定区域之内多种方言所共有的语言特征。区域特征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词汇的、语法的,本文先讨论方音的区域特征。

所谓“一定区域”,可大可小,几个大方言区之间也可以有共同特征,一个方言区之中必定有一批共同特征,小的方言片或数个方言点之间也可以有共同特征。为方言分区、分片可因标准不同而有不同分法,区域特征是就多种方言作比较提取出来的语言事实,在方言分区未经周密研究之时,很难为区域特征定性为方言区特征、方言片特征或诸方言区之间的共同特征。

方言的区域特征的分布总是地片相连的。方言区的语言特征通常也分布于相连的地片,如果该方言由于移民而在区外分布,其共有特征就未必是连片的,这是方言区域特征和方言区的语言特征又同又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方言之间的共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相同的特征。例如 n 和 l 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则有同(都是响音)、有异

(气流通道不同),在语音演变过程中可分可合,若是合流则又有三种可能:混为 l,混为 n 或自由变读。类型特征可能与地域特征叠合,例如泥和来成都、武汉都混为 n,长沙、南昌则混为 l;但也可能没有关系,例如福州话和广州话都是数十年来趋于相混,自由变读,这是类型特征,而不是区域特征。

桥本万太郎教授在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中提到“区域特征”(area features)。他界定的“区域特征”是“某区域之中超越语言差别的所谓语言特征的‘扩散’(diffusion),它是与所谓演变(evolution)相对立的概念”。这和他所提倡研究的“地理类型特征”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后来他觉得“区域特征”的提法不利于引导人们去阐明语言特征的地域扩散的内在机制,因而提议废止“区域特征”的提法,后来,他也便改称为地理类型学。^①

事实上,语言的类型特征和地理特征和源流特征虽然可以是相关的,但都是不同质的。类型特征是超乎时空,着眼于结构或功能的类型分析;地理特征是在地域上横向扩散而造成的共同特征;源流特征则是由于同源关系而形成的发生学上的共同特征(往往表现为对应关系)。桥本万太郎是企图把前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所以称为地理类型学,而本文则主张把后两者都包括在内进行研究,还是称为区域特征。

把区域特征扩大到最大范围当然也包括存在于一定地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共同特征(像上文所引桥本先生所界定的那样),但它和同一语言的方言间的共同特征应该有许多不同,必须另外研究,本文讨论的不包括这部分内容。

①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二 方音区域特征有两种类型

应该说,纵向的同源关系和横向的渗透关系都会造成方言间共同的区域特征。桥本万太郎说:“语言历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不是由该语言内在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周围语言的互相影响和作为其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发展”,其实语言内在的对立矛盾(音素间的对立、音义间的矛盾)才是语言发展的主要动因,受了别种语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异,这种外因也要经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说推动语言发展的“内在的因素”作用极小,那么穷乡僻壤、交通阻塞处的单一方言以及孤悬海岛、不与别种方言交往的方言就会是经久不变的了。事实并非如此。在福建境内,方言最为复杂的地方算是连城县及其周边乡镇,那里是闭塞的山区,福建三江水系(闽江、九龙江、汀江)的分水岭,位于闽南方言、闽中方言和闽西客语的交界处,十几种不能通话的小方言各自独立发展,并没有形成很多区域特征。

几个方言之间既然有纵向的同源关系(亲属关系),它们在历史上就总是在同样的地域共处过,体现过同样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后来它们各自流播在不同的地域,这些共同的语言特征不可能荡然无存。换言之,同源的姊妹方言之间必定会有共同的语言特征。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是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在历史上它们曾经是同支。经过许多史家的研究,客家的迁徙在隋唐之际主要是散居在江西中北部,唐末进入赣南、闽西,两宋期间大量迁入广东。正由于有这一段历史的渊源,客赣两种方言确实存在着不少共

同的语音特征,《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就列举了 14 条,较为重要的有:全浊多混入次清,庄、精逢今洪音无别,晓母合口字混入非组,同摄一二等韵都有不同韵腹的对立,梗摄字白读韵腹为 a,宕江韵母混为 ɔŋiɔŋ,次浊声母字阴阳入两边走等等。无怪乎历来不少学者认为客、赣可归为一个方言大区。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南的吴语和闽东闽北的闽语。浙闽交界处,东有雁荡山,西有仙霞岭,经济落后,交通阻塞,人烟稀少,人们历来交往并不多,方音上的一些富有特色的共同点很难用横向的渗透去解释。例如丽衢片“舌上读舌头”(猪、长、帐、竹四个字,丽水 / 衢州音:ti¹、dəŋ²/diẽ²、tiaŋ⁵、tiu⁷?/tə⁷?)是闽语通例,温州片效摄一二等不同韵(宝 / 饱:乐清 pə³/pa³,温州 pɜ³/puɔ³)同闽东,船、禅母读 j-(温州:船 jy²、上 ji⁴、唇 jyoŋ²、赎 jyo⁸)近闽北,匣母字白读 g-,j(温州:厚 gau⁴、衔 ga²、含 gaŋ²、寒 jy²、汗 jy⁶)则闽东、闽北皆然。丁邦新先生曾有过一种推论:“我们发现有一些吴语方言中具有‘端、知’不分的现象,这种现象大致局限在白话音里,因此推断现在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①说浙南吴语有闽语的成分自无争议,说闽语有古吴语的继承也是站得住脚的。(至于闽语里,应该还有古吴语以外的源流,此处不加论证)

横向的渗透形成的区域特征往往分布在大小方言区(片)的交界地带,大范围的可以包括几个大方言区的一批连片方言点,中小范围的可以包括几个方言小区(片),小范围的则见于某个方言小区。从渗透源说,大多是不同的方言,有时也有

^① 丁邦新:《史语集刊》(台北),第 59 本第 1 分。

民族语言影响的结果。这里也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长江流域有不少城市，从成都、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到扬州、苏州，都有后鼻音韵尾 $-ŋ$ 受 i 、 $ə$ 韵腹同化而前移混入前鼻音 $-n$ 的现象，把古深、臻、曾、梗的相当大部分字（开口一二三四等的字都有，还包括部分合口字）都读为 $ən$ 、 in （扬州无 in 韵，读为 $iŋ$ ），例如针、真、恨、顿、轮、等、层、升、胜读为 $ən$ ，林、心、民、斤、兵、丁、情、灵读为 in 。论方言区，其中有官话，也有湘、赣、吴等方言，论地域，横贯 6 个省，这显然是相互影响而趋同的结果。其渗透源可能是来自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因为在远离长江的湘、赣、吴诸方言并没有多少点表现这个特征。对于南方方言来说，官话应该算是强势方言。

在赣方言和客方言的交界地带，包括赣语的吉安片（井冈山地区）和客家话的赣南片和闽西片，古阳声韵字除通摄之外，各摄都有读为鼻化韵的，尤其是靠西的赣县、大余、茶陵、永新一带，读鼻化韵的字更多。陈昌仪在谈到赣语吉安片特点时把“有丰富的鼻化韵母”作为最重要的韵母特点。“横江、万安县、高陂、永新县、莲花县、坊楼、宁冈县、井冈山等 8 个代表点除通摄阳声韵有 $[ə̃ŋ, iə̃ŋ, uə̃ŋ]$ 以外，其余的阳声韵都读为单纯的鼻化韵母。”^①看来这个特征是自赣南闽西的客家话向吉安一带扩展的，因为赣语的其他片鼻化韵并不多见。

在闽方言的几个小区之间，也有几个区域有明显的共同语音特征。

1. 闽江流域（含沙溪、建溪、富屯溪）的一些县和下游

^①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不少县,古阳声韵字有一种“复韵尾”的读法,(即同时有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永安有 $\varepsilon\eta$ 、 $i\varepsilon\eta$ 、 $y\varepsilon\eta$,沙县有 $\varepsilon\eta$ 、 $i\varepsilon\eta$ 、 $y\varepsilon\eta$ 、 $\text{æ}\eta$ 、 $\text{ɔ}\eta$,建瓯有 $a\eta$ 、 $ua\eta$ 、 $e\eta$ 、 $ie\eta$ 、 $\text{æ}\eta$ 、 $u\eta$ 、 $y\eta$,建阳有 $a\eta$ 、 $\text{ɔ}\eta$ 、 $e\eta$ 、 $ie\eta$ 、 $ue\eta$ 、 $ye\eta$,福州有 $\varepsilon\eta$ 、 $ou\eta$ 、 $\phi\eta$ 、 $a\eta$ 、 $\text{ɔ}\eta$ 、 $au\eta$,古田有 $\text{ɔ}\eta$ 、 $e\eta$ 、 $\phi\eta$ 等。这个特点在闽北各县表现最充分,可能是沿江而下向闽东扩散的,而在闽东北片(福安、宁德一带)未受影响。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唐以前闽北是全省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强势方言。所以这种现象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

2. 闽南方言各点阳声韵字白读音都有各种鼻化韵读法,如厦门话就有 $\tilde{a}$ 、 $i\tilde{a}$ 、 $u\tilde{a}$ 、 $\tilde{o}$ 、 $\tilde{e}$ 、 $\tilde{i}$ 、 $\tilde{ai}$ 、 $u\tilde{ai}$ 、 $\tilde{au}$ 、 $i\tilde{au}$ 等,这种情况向西影响了闽中方言,永安话有 $\tilde{a}$ 、 $i\tilde{a}$ 、 $u\tilde{a}$ 、 $\tilde{o}$ 、 $i\tilde{o}$ 、 $\tilde{i}$ 、 $u\tilde{i}$;向北则影响了仙游话($\tilde{a}$ 、 $\tilde{a}$ 、 $i\tilde{a}$ 、 $u\tilde{a}$ 、 $y\tilde{a}$ 、 $\tilde{i}$ 、 $u\tilde{i}$ 、 $y\tilde{i}$ 、 $i\tilde{u}$)。闽南话对永安话、仙游话来说自是强势方言。

3. 同是闽南方言区,粤东闽南话包括潮州、潮安、汕头、澄海、饶平、揭阳、潮阳等点古阳声韵字只有 $-m$ 、 $-\eta$ 和鼻化韵的读法,没有 $-n$ 韵尾(在海陆丰一带 $-n$ 尾韵也只有 in 、 un),这一现象数十年间已经向北扩散,影响到与粤东连片的闽南漳州地区,从诏安、漳浦、东山到漳州、龙海一带,60岁以下的人也大多把 $-n$ 尾韵发成 $-\eta$ 尾韵了。这显然是因为潮汕地区数十年来经济发达,方言也成了强势的,回头对漳州方言施加影响。

4. 海南岛的闽语是说闽南方言的人宋元之后从福建东南部经粤东、雷州陆续由移民带上岛的。开始时岛上原住民黎族和壮族(所谓临高人)人口占着优势,加上与闽人通婚往来,在许多地方杂居成村,海南闽语于是用紧喉浊

音 η_b - η_d 取代原来的 p-、t-, 把 ts'- 发成 s-、s- 发成 t-, 加上鼻化韵一律丢失了鼻音说成元音韵, 这就使海南闽语在语音上自成一格, 有人已经认为它应是与闽南、粤东的闽南话分立的另一个次方言区了。有 η_d 、 η_b 声母, 无 ts'- 有 s-, 无鼻化韵等全是黎语的特征, 海南闽语的这些特点明显是受黎语影响的结果。

三 方音区域特征有待研究的课题

汉语方音的区域特征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内容, 也是比较研究的结果。鉴于这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 这里试就已经了解的情况提出若干需要着力研究的课题。

第一, 方音区域特征有哪些方面的项目? 当然, 你可以说: 不就声、韵、调三方面项目吗? 这只是语音分析的一种考察点, 事实还有另一种语音变异的考察点, 这就是音值变异、音类变异、字音变读和连读音变。

音类相同、音值有异, 这也可以构成方音的区域特征。例如闽语的莆仙方言把其他闽语的 s- 声母读为 ʃ-, 罗源话则读为 θ-, 这是音值差异。粤语的台山、开平、阳江、高州、信宜一带的 ʃ- 和 s- 有对立, 是古心母和审母的区别, 这是音类的差异。

历来考察方音差异往往局限于以广韵系统为参照罗列音类的差异, 其实音类差异之下有音值的差异, 之外还有字音变读和连读音变。

最常见的字音变读是文白异读。文白异读是方言语音受共同语语音或外地方音影响而增加的字音, 它往往反映

了不同历史时代的读音。有文白读对立的字多或少,不同方言相差很大。例如闽语区普遍有文白异读,闽南方言可能有一半的常用字有文白读,而粤语区文白异读就少。湘语和北片吴语见系二等字不少有文白读 $t\phi-t\phi'-\phi$ 和 k,k',x 的对立,如果不是徽语和赣语隔开,也是连片的区域特征。客赣方言口语常用的梗摄字普遍有 $\epsilon n, in$ 和 $a\eta, ia\eta$ 的文白异读,这也是跨方言区的区域特征。官话区大多数没有入声韵和入声调,但古入声韵今读常有文白对立。

另一种很常见的异读是辨义异读。辨义异读古来就有,有区别词性的“破音字”,也有“音随义转”的异读。后来不同的方言有沿用这些异读的,也有缩减了的或扩充了的。辨义异读的增减也是方音差异的重要方面。例如“肚”,《广韵》当古切:胃也,徒古切:腹部。今官话地区大体延续这两种音义;浙闽沿海(温州、福州、厦门)与此相反,读上声指腹部(腹肚),读去声指胃(猪肚);广州、梅县和潮汕地区都读上声不加区别。后者便是跨省跨方言区的方音区域特征。又如“离”,《广韵》吕支切:“近曰离,远曰别”,又力智切:去也。官话大多旧读分,新读只有阳平。吴语、湘语、客家、粤语大多不分,读为阳平,南昌和建瓯同读去声,福州话至今分读阳平和阳去。

至于连读音变,包括轻声、变调、儿化、小称音变、声母类化、变韵等。自从多音词占优势之后,这些音变越来越成为方言语音的区别特征了。各地的官话儿化、轻声多,湘赣方言轻声特别发达,吴语是连读变调特别复杂,客家和粤语则各种连音变化都不多见。小称音变见于吴语、粤语和某些赣方言。在闽方言区,闽东有变声、变韵、变调,

闽南有轻声、变调,闽北则基本上都没有反映。在一些较小的地域也有强势方言向邻近地区扩散而形成区域特征的,例如闽东的变声向莆仙方言扩散,变韵向闽中沙县话扩散,闽西客话的少量连读变调,也可能是闽南话向西扩散的结果。

第二,方音区域特征的分布有什么规律,也很值得考察。

首先,因同源关系或因横向扩散而形成的区域性特征在分布上就有不同的表现。就初步接触到的材料说,因同源关系而形成的区域特征往往分布比较全面而均衡,上文所述客赣方言全浊声母清化后读为送气清音,在各地方言点例外不多;而因横向扩散而造成的区域特征则往往只是分布在方言区的边缘地带,例如长江流域的 $in \rightarrow in$ 、 $ən \rightarrow ən$ 到了下游地区就只有部分反映,吴方言的许多点还是 in 、 $ən$ 照旧。潮汕地区的 $-n \rightarrow -ŋ$ 向北扩散只到漳州市,对厦门及泉州地区则不起作用。

其次,在一个区域之内,有的只有一两条相同的方音特征,有的则有多条“特征丛”。不同的区域所分布的特征的多少有什么规律?应该说,不论是同源的方言区域或相互渗透的方言区域,凡是经历时间长,发育成熟的方言地区,其区域特征就会形成多种项目的“特征丛”,像客赣方言之间共同的区域特征就多;而扩散时间不长,地域不广的区域特征的分项就少。

再次,在横向扩散中,什么方言向什么方言扩散和渗透,也应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一般说来,人多地广势力强的方言向小方言的扩散自会更多。上文所述“离”只读阳

平,显然是梅县和潮州受广州话的影响,因为粤语在广东是强势方言。在考察这一点的时候,当然得注意分清扩散、渗透的时间。海南闽语如今还是全岛通行的不分地区不分民族的共通语了,它受黎语影响的时代应是闽人上岛不久的时候,当时的黎民应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说词汇的借用是由于概念的缺乏、交际的需要,不同方言区的人有意相互借用的话,语音特征上的趋同则是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没有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没有明显的强弱势,方音区域特征是难以形成的。

最后,方音区域特征的分布究竟是积木拼图式的还是网络交叉式的?这一点对于研究方言分区的理论和标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人们在研究方言分区时早已发现,用不同的条目作标准,就会划出不同的分区线来,因为方言特征的分布地域很少是完全叠合的。这就是说,方言区域特征是分层次的,有的区域大,有的区域小,不同的区域各有各的特征。到了方言区的边缘,有些特征是向内靠的,有些特征则与外区相同。例如下江官话尽管有不少特征是与其他官话相同的,但也有不少特征是与江南的吴语湘语雷同的。例如扬州话就没有翘舌音,没有元音韵尾,有入声韵尾(同吴语)和入声调类(同湘语)。可见从方音特征的交叉式分布就可以得出结论:要把所有方言点都归入某些方言区而又要求所有的分区特征条目都能“对内统一对外排它”,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方音区域特征还应该从纵向的角度考察其形成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

关于方音区域特征的形成过程,我们也许可以从个别

方言语音演变过程得到一些启发。例如音值的演变和音类的演变,通常见到的现象是音值的趋同在前,音类的合并在后,前者是量的积累,后者是质的飞跃。例如 -n、-ŋ 韵尾的合并常常经历过 -n 的阶段,或者经过 -n~ -ŋ 自由变读的过程。现在的漳州人之中,只有少数“字正腔圆”的老年人能区别 -n、-ŋ,而中年人里就五花八门了,有的 -ŋ 并入 -n,有的自由变读,年轻人则一概发为 -ŋ,可见潮汕话对漳州话的渗透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

至今音类的分合、字音的变读和连读音变也有个先后的过程。关于音类分合的方音区域特征,人们很快就能举出实例并且不少是分布的区域广的,这是因为音类分合上的同源或渗透都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而各种连读音变的趋同和扩展则比较少见,即使有,分布的区域也较小。这当然与汉语中连读音变的兴起较迟有直接的关系。唐诗、宋词直到元曲中“儿”还用来作韵脚,唐宋属支韵,元曲是“支思”辙,到了明代杂剧,儿开始读为 ə 或 ər,入韵的是“儿”前的字。这说明儿化现象是明朝发生的事,只有 300 多年的历史。

如果我们集中力量进行某一区域的方音共同特征的研究,大概还可以考察出在诸多的特征丛里,哪一项是先实现的,哪一条是后发生的,因为先实现的总是比较整齐划一,后产生的可能还有参差。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设想方音区域特征的形成总是从少到多逐步增加的,在理论上和实际观察中大概都可得到推论和证实。那么,方音区域特征的扩展有没有局限呢,其发展前途又怎样呢?有没有诸多区域特征使得该区域的方言发展成为新的方言区的可

能呢？

在这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种地区，一是方言的交界处，一是双语区。

60年代在总结福建方言普查时，莆仙方言的定性是一个讨论的热点。最后多数学者都同意在闽方言中应该把莆仙方言立为一个二级区，虽然这个区只有两个县，300万人口。主要根据就是它兼有闽南和闽东两种方言的特征，从文白读系统、基本词汇说，它接近闽南语，但是辅音韵尾的归并及声母的连音变化却又同于闽东。历史上它原是泉州府属地，宋代建“军”，明代置“府”，后来又因地近省城，接受了大量福州话的影响，诸多双向的类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区域特征的系统。看来，这是一个方言区交界处由于长期的横向渗透，重新整合而成的新区方言的典型。当然，多元的区域特征要形成新区方言是需要特定的条件的。一般来说，渗透的时间要长，地域要稍大，还有其他许多历史文化的原因。在闽中腹地，尤溪县的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形，但只能算是边界方言的特殊点，而不能立为新的方言区。

在双语双方言地区，由于长期并用两种方言，彼此间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久而久之也可能形成区域特征丛，从而引起部分质变。广东中山市内的闽方言就是这样的事例。那里的闽方呈群岛状，总人口占全市的三分之一，有的点闽南话面貌较清晰，有的杂有闽东话的特点，同时又普遍通行粤方言，甚至年轻人都以说“白话”更为流利。粤方言的许多语音特征包括音类、音值、字音异读、小称变调都悄悄进入方音体系，词汇语法上的混同就更加明显

了。由于这些混杂,中山闽语确实发生了部分质变。在湘南,有些地方兼用湘南土话和西南官话,有些人已经很难分清哪个音是土话的音,哪个是官话的说法。在粤北,粤北土话至今面貌不清,难以定性,数十年来又普遍通行粤语,不同方音的各种渗透也十分严重。进一步调查这些地区的方言,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区域特征,发现许多崭新而有趣的语言现象。

四 研究方言区域特征的意义

研究方言的区域特征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为方言分区提供最重要的依据。应该说,大大小小的方言区域特征摸清了,为方言分区也就水到渠成了。以往为方言所作的分区常常与新发现的材料不相符合,这是因为在分区之前对于各种不同地域的共同特征缺乏足够的比较研究,要么参加比较的点太稀疏,要么条目太贫乏。直到目前为止,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也还有些不同的意见,其中有材料不够充分(还有不少方言点我们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原因,也有对分区的标准理解和掌握不一的问题。看来,对于方音区域特征的研究,不但需要继续努力发掘材料进行比较,而且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和探索。

方音区域特征的研究就是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方言的比较研究对于方言史的追寻和方言学理论的探索都是一条根本的出路。

由于同源关系而造成的区域特征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探寻姊妹方言结伴同行和分手上

路的历史时期及过程,都能提供重要的佐证。客赣方言的关系,浙南吴语和闽东北闽语的关系,粤语和“平话”的关系等悬案,都有待于这些地区的方言特征的比较研究,这是不待言的。

由于横向渗透而造成的区域特征的研究,对方言学的理论建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文曾经批评过桥本万太郎不重视语言演变的“内因”,但对于他的充分重视语言的横向作用(相互影响)并把它认定为语言演变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倡导语言类型地理学的研究,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的。朱德熙先生说他“高瞻远瞩,一空依傍。因为站得高,站得远,所以能够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①,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由于理论上的欠缺,我们过去对方言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推动方言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所做的考察也很少。在研究福建境内的双方言现象时,我们曾经对双方言地区的相互渗透作了一番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提出了方言间渗透的不平衡性——“向”和“度”的观点,对方言间相互渗透的过程和结果也作了一些分析。认为近代社会以来,语言间的渗透越来越成为语言演变的主因,两种方言间的渗透,依强弱势而表现出一定的“向”和“度”。渗透的积累不但造成了方言间的许多“过渡区”,使方言间的界线模糊化,而且还可能形成混合型方言。这些初步的研究心得还有待于其他地域的方言比较研究的验证,有待深化研究。此外,有些问题至今还很少有人触及。例如古代不可能没有方言间的

① 李如龙:《长江话两音节三音节的连读变调》,厦门大学学报 1965 年第 2 期。

渗透,其状态如何,和近现代的渗透有何区别?方言间的渗透同方言与民族语言间的渗透有没有不同的途径和结果?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和方言间的渗透又有什么不同等等。

方音区域特征的研究还可以为其他人文学科所用。例如关于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官话地区的语言特征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对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他较小地域的语言共同特征的研究则可帮助人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语言教育中,方言区域特征的研究对于提高语言训练的针对性,为编写地方性语言训练教材提供准确的素材,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也有重要的价值。

方音的区域特征只是方言区域特征的一部分,在词汇的扩散和语法成分、语法规则的借用上可能和语音的渗透还有不同的规律。本文所述,如果能引起人们对于方言区域特征的注意,进一步重视方言间的比较研究,作者将会感到极大的欣慰。